

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庐山会议,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,分成前后两个阶段。在前一阶段,“秀才”们(指参与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,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)大都与积极促进“大跃进”的地方负责人发生了矛盾。

庐山会议“秀才”与地方领导针锋相对

田家英和李井泉

田家英自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,庐山会议时任中办副主任等职。

早在1959年春,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,到四川进行蹲点调查,掌握某个所谓“高产丰产”公社虚报产量的问题。不久,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指示信下达,信中特别提到合理密植和要讲真话两条。但毛泽东的指示信被封锁,四川省没有在县级以下传达。田家英突破封锁,在蹲点公社广播了指示信。上庐山后,田家英把公社浮夸虚报产量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,引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不快,两人发生争吵。在开小组会时,田家英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等问题时,组长李井泉批评了他。最后“官司”打到毛泽东那里,毛泽东没明确判定谁是谁非。

李锐和柯庆施

李锐自1958年初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,庐山会议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。在庐山,李锐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矛盾尖锐。据李锐回忆,1958年5月华东地区计划会议在上海召开,制订次年“跃进”计划,华东地区钢指标涨到600万吨。李锐泼了冷水,认为电力无法保证,令柯庆施很不满。

在此次的庐山会议上,李锐于7月20日的小组发言中特别提到:华东地区600万吨带头,远超客观可能。这些话应该说是针对华东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的。23日,毛泽东讲话后的两

三天里,会议形势急转直下。这期间,柯庆施曾在吃午饭时过来和李锐干杯。李锐大声说,柯老,你是见过列宁的人,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,并转回餐桌不予理睬。

陈伯达和叶飞

陈伯达自1939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,庐山会议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。1959年一二月间,陈伯达回到家乡福建晋江地区,进行蹲点调查。2月26日,他写信并通过福建省委报告中央和毛泽东。其中不乏一些正确意见,实际上是晋江地区干部、群众的呼声。这对于毛泽东继续纠“左”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。

在庐山会议前一阶段,陈伯达曾两次作长篇发言,批评“大跃进”中的一些弊端。他对福建的工作提出批评,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发生了争论。7月23日后的小组会上,陈伯达受到批判,他去福建调查的事也被重新提起。

胡乔木和曾希圣

胡乔木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,庐山会议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。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》的争论上。

按照原来的安排,会议开半个多月,通过一个会议纪要性的文件就结束了。文件起草小组成员,毛泽东原来指定5个人:胡乔木、杨尚昆、陈伯达、吴冷西、田家英。7月13日,毛泽东建议起草

小组增加陆定一、谭震林、陶鲁笏、李锐、曾希圣、周小舟,起草出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》。从17日起,在讨论《议定记录》时,一些人有意主要集中胡乔木执笔的《关于形势和任务》上,认为对“大跃进”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表达得不够充分有力,缺点写得很具体,这样传下去要泄气。曾希圣对这一段写法不满意,他在19日的小组发言中说:“至于去年工农业比例失调,我不承认……我的看法很乐观,不经过这样的大演习,我们受不到这样的教育。”

毛泽东的最终态度

在庐山上与“秀才”们发生纷争的不只是上述几个地方负责人,还有其他人。矛盾的存在,主要是由于“秀才”们对“大跃进”及纠“左”的看法跟一些地方负责人存在分歧。“秀才”们另一个坚持纠“左”的表现是对彭德怀、张闻天等表示了支持。反观一些地方负责人,特别是1958年热度较高、错误较严重的地方负责人,面对“秀才”们积极主张纠“左”,起而反击。有人在23日后的批判中把“秀才”们与彭德怀并列,说他们一个鼻孔出气。

对毛泽东来说,一方是他身边的人,一方是“大跃进”的倚重力量,在纷争的前期,他没有轻易表态。但随着毛泽东转向批判彭德怀、“反右倾”,也就自然宣判了“秀才”一方的落败。李锐在会上即被淘汰出“秀才”行列,定为“反党集团成员”。其他几人也中央立案审查。(据《党史博览》)

高岗之子高毅：一生不得志

1948年,中央选派21名中央领导人和烈士的子女赴苏留学(被称为“4821”)。学成回国后,“4821”在新中国建设中担当重任,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。当然也有个别例外,高岗之子高毅就是其中之一。

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工厂

高岗与前妻杨芝芳生有两个孩子,大儿子3岁时因病死于延安。高毅是次子,1930年出生。高毅在1938年成为“高干子弟”之前,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打工好长时间。

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闹革命时,妻子和儿子在老家差点被地主卖掉,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,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。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,高岗才找到了他们。1939年,高毅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,陈伯达之子陈小达,刘少奇子女刘允斌、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去了苏联。1951年年底,按高岗的意愿,高毅进入培养高级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。这时,高毅结识了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化学系学生宋丽达,二人很快结了婚。但后来因为高岗的事,还没毕业,高毅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。

被定为“反革命集团”头子

1960年,为照顾母亲杨芝芳,高毅全家从哈尔滨迁到西安,和妻子一起在430厂做技术员。“文革”期间,高毅被定了个以他为首的“反革命集团”的罪名,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。“4821”这些留苏学生在“文革”中,曾以“苏联间谍”之名受到迫害。而高毅既是“间谍”,又是“反党集团”首脑之子;既“要为老子翻案”,同时自己还是一个“反革命集团”头子,势必会受到更大更重的打击。幸运的是,他和妻子被好心的工友们保护了起来。

受父亲牵连一生郁郁不得志

然而,由于受父亲问题的牵连,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。1979年经王震批示,高毅才调回北京,在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从事机床研究,最后以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身份离职休养。

高毅的“4821”同学在他最困难的时候,仍保持着兄弟姐妹一样的友谊。而令高毅感慨的是,1939年与他一同前往苏联的6个孩子中,有3个都英年早逝。陈小达因工作、婚姻受到挫折无人交流,26岁卧轨自杀;刘允斌在“文革”中不堪凌辱,42岁时也卧轨身亡;孙维世则被关进监狱,活活打死,年仅47岁。

(据《文史博览》、《高岗传》)

王明妹妹改名换姓也难逃厄运

陈映民,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,是大名鼎鼎的王明(原名陈绍禹)的胞妹。她经历过长征,又参加了西路军,死里逃生。而因为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,这个名字长期被历史的烟尘尘封。

从童养媳到女红军

陈映民生于1913年,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。她出生时,大哥陈绍禹、大姐陈觉民、二哥陈绍伟,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。而陈映民出生后第7天,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人家,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。

1931年春,陈映民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。1932年10月,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,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。陈映民抱上她3岁的儿子吕美成,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,随军征战。途中,陈映民不慎丢失了孩子。随军入川后,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,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。1935年3月底4月初,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,到达甘肃境内

时,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。1936年10月,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。西路军损失惨重,陈映民被俘后,被押解到青海省城西宁,在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做苦工。后来,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,逃了出来。几经颠沛流离,她返回阔别5年的故乡。1937年末或1938年初,陈映民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,投奔陈绍禹。这时,陈绍禹早已改名叫王明,坐镇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。

改名王营受到连累

1938年4月间,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,恰是张国焘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,革命圣地再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。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,原西路军回来的人,都得经过政治审查。当时,陈映民也许是急于跟张国焘划清界限,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,于是改名换姓叫王营。但命运弄人,这次改名反而为她以后的悲剧埋下更大隐患。

在延安,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

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,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、出纳员、营业员。延安整风运动中,王明成了“左”、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,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。

“文革”期间第二任丈夫被整死

解放战争时期,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,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。1939年,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。“文革”期间,王营这一名字,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“铁证”。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,挨过批判斗争,家也被抄了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,1971年被整死。不仅如此,“文革”中清理阶级队伍,陈映民因曾被俘而成为“叛徒”、“张国焘的走狗”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陈映民一家得以平反昭雪,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。更值得庆幸的是,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,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。母子团圆,骨肉相亲,皆大欢喜。(据《党史博览》)